

斯波斯基《语言政策再思考》中的解构与重塑

方 愈 (Fang Yu)¹

摘要：斯波斯基 (Spolsky) 的《语言政策再思考》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2021) 是其在语言政策领域四十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其标志性的“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三要素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更新：通过对传统国家中心视角的解构，将语言政策分析的起点转向个体说话者。斯波斯基通过广泛的全球案例，系统考察了个体、家庭、机构、社区、政府乃至超国家层面上的语言实践、信仰和规划努力，深刻揭示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混沌性，并强调了非语言因素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此书为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权威指南”，但在理论分析深度、对“命名语言”本体论的阐释、二元对立的呈现以及引用来源的语种多样性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作为当代语言政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对其数十年的学术积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拓展与重塑，挑战了传统范式，主张从更为整合和动态的视角理解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管理；数字语境；个体说话者；非语言因素

Title: Deconstruction and Reshaping in Spolsky's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Abstract: Spolsky's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2021) is the culmination of his 40 year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policy. The book propos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update based on its iconic three-element model of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belief,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 centered perspective, it shift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anguage policy analysis to individual speakers. Spolsk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language practices, beliefs, and planning efforts at the individual, family,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even supranational levels through extensive global cases,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dynamism, and chaos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emphasiz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nonverbal factors in them. This book provides an “authoritative guide” for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tology of “named language”, present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of citation sources.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ontemporary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Spolsky deeply reflects, expands, and reshapes his decades-long academic accumulation in this book,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¹ 方愈 (Fang Yu)，广州商学院国际学院教师，爱丁堡大学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国际中文教育。电邮：fangyu722@icloud.com。

paradigms and advocating for a more integrated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management; digital context; individual speakers; non-linguistic factors

一、引言

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伯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者。继《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2004）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2009）等重要著作之后，斯波斯基于2021年推出了其最新力作《语言政策再思考》（*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其过往理论模型的反思与更新，更通过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案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的全球语言政策图景。

如书名所示，此书的核心在于“再思考”。斯波斯基对其早前提出的模型进行深刻反思，对传统范式进行解构，并提出一项大胆而重要的理论转向：将语言政策研究的起点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宏观视角，转移到微观的、以个体说话者为起点。这一转变旨在更好地捕捉语言政策运作中的多层次互动与非线性影响，解释为何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往往难以奏效。此外，此书还突出强调了非语言因素在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关键作用，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问题“语言中心主义”（*linguicism*）的狭隘认知。

本文旨在对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进行全面深入分析，重点探讨其如何深化语言管理理论，对其进行重塑与拓展，如何将复杂性理论、多模态交流及数字语境纳入考量，以及其对传统政策实践的批判性评估。我们将分析该书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及实践启示方面的突出贡献，并对其潜在局限性提出批判性思考。

二、主要内容概述

《语言政策再思考》全书由导论和14个章节组成，结构清晰，逻辑严谨，逐层深入地探讨了语言政策的各个层面和核心议题。

（一）引论：语言政策中的非语言因素

此书的理论核心依然是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三要素模型：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然而，此书的“再思考”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以往的呈现顺序，将个体说话者置于分析的起点，而非传统上聚焦的民族国家。

更重要的是，斯波斯基在导论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语言中心主义”，强调语言政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涵盖人类生活的复杂环境条件中”。他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特性，物理地理、人口变化、技术发展、内战、流行病、腐败，甚至冲积土壤、道路系统、出生顺序等非语言因素，都可能对语言接触、语言选择乃至语言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视角的引入，使得语言政策研究变得更加全面和多维，呼应了语言生态学的思想。

（二）从微观到宏观的语言政策图景

此书的章节安排体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从个体说话者开始，逐步拓展到不同的领域和层级。

微观层面（第 1-2 章）：聚焦个体和家庭。斯波斯基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试图“重新思考以国家语言政策为历史焦点的传统叙述顺序”。他强调个体和家庭是语言政策的基础，个体通过态度、动机、意识形态和家庭语言选择，不断调整自身语言能力，参与语言政策的协商，进而影响社区、教育或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结果。家庭被视为“语言维持最重要的场域”。

中观层面（第 3-6 章）：聚焦学校、社区、职场、公共机构（媒体、宗教、医疗、法律）和军队等中观层面。教育被视为“仅次于家庭的第二大语言管理源”，受国家主导但受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力量制约。社区和职场通过语言景观塑造语言实践与信念。公共机构和军队则因其特殊性对语言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核心议题与影响因素（第 7-10 章）。以勃鲁盖尔画作《大鱼吃小鱼》为隐喻，探讨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以及语言管理决策权的分配问题。作者指出，语言政策常成为维持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工具，但其权力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梯度化的动态过程。他强调语言流失往往源于个体对自我发展和社会经济解放的选择，而非仅仅来自外部压力。

宏观层面：权力结构与语言不平等（第 11-13 章）。直至第 11-13 章才讨论国家和超国家语言政策。斯波斯基以“但谁在乎”为第一节标题，刻意与聚焦宏观政策的“经典语言规划”时期保持距离。他认为，以个体为起点更易理解多层次语言政策及个体相对于（超）国家政策的能动性，但同时也承认民族国家仍是语言政策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结论（第 14 章）：理论的局限与实践的复杂性。在最后一章“理论再思考”中，斯波斯基强调，由于语言政策这个研究对象“反复无常”，使其难以被简化为普适模型。他呼吁持续的“思考与再思考”，避免草率得出理论结论。理论突破需依托更细致的数据分析、开放的理论视角、实证的细致入微和对情境的敏锐觉知。

三、贡献与亮点

《语言政策再思考》是斯波斯基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结晶，它不仅是其先前著作的简单重述，更是对自身理论模型的持续反思、修正和深化。

（一）以个体为起点，应用复杂性理论

此书最核心的创新和贡献在于提出将语言政策分析的起点从宏观的民族国家转向微观的个体说话者。斯波斯基明确指出，他试图“重新思考通常的呈现顺序，即其历史性地关注国家语言政策”。这一范式转移正是对传统线性思维的解构，也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次重要重塑，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更是对语言政策现实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往往忽视了语言政策执行者和承受者——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及其日常语言实践。他强调个体说话者的语言能力、语言信仰和自我管理，揭示了个体在语言维系与转向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往往难以奏效。

斯波斯基将语言政策视为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强调其非线性互动、涌现现象、自组织特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语言政策的制定不应是僵化的蓝图，而应是持续的、实验性的、需要不断学习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斯波斯基对过去许多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指出其脱离实际、忽视非正式力量、线性思维和政治驱动等局限。他呼吁更理性、科学、适应性强的语言

政策，强调在地性、社区参与和对语言系统内在规律的尊重。此书贯穿始终的反思精神，使得此书不仅仅是对已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作者四十年研究生涯中积累的最新洞察和理解。

（二）深化语言管理理论与新维度整合

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对“语言管理”维度进行了更细致的剖析，强调其并非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互动过程。他参考了捷克学者的语言管理理论模型，凸显非正式语言管理的重要性，指出家庭、社区、社交媒体乃至个体都在无形中实施着语言选择、规范和传播的管理行为（Jingzhen Liu & Manchun Dai, 2024）。语言政策并非一劳永逸，需要建立持续的监测和评估机制，根据语言生态的动态变化和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及时调整。这与中国学者一直在探讨的“语言治理”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更重要的是，斯波斯基将多模态交流和数字语境等新维度纳入考量。他探讨了图片、视频、表情符号等多种模态如何共同塑造语言使用（Kress, 2009），并前瞻性地关注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对语言政策的深远影响。他讨论了数字语言景观、机器翻译的影响、算法与语言偏见以及在线社区对语言活力的作用，使得其理论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

（三）强调非语言因素与跨学科视野

斯波斯基在此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语言政策不应被孤立地视为纯粹的语言问题，而应置于其复杂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中考察。他反对“语言中心主义”，强调了地理、人口、技术、政治、经济、战争、流行病甚至腐败等众多非语言因素对语言政策的深远影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大贡献。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得语言政策研究能够更多地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对话。

这一洞见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促使未来的语言政策研究超越狭隘的语言学范畴，走向真正的跨学科融合（Wang, 2022）。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乃至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更“脚踏实地”的研究，以期得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发现。

（四）范式创新：从“层层剥洋葱”到“解剖政策之鱼”

正如该书封面所选用的版画《大鱼吃小鱼》所寓意的，语言政策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斯波斯基试图通过“解剖政策之鱼”，而非“层层剥洋葱”（如 Ricento and Hornberger, 1996），构建一种重新审视语言政策本质的“更新版”理论，展现其混乱而复杂的特性。“解剖政策之鱼”暗示着一种对政策进行深入、彻底、系统性分析的方式。就像解剖生物一样，它试图揭示政策的内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隐藏的功能、矛盾和潜在的缺陷。

“层层剥洋葱”意味着一种渐进式、由外及内、逐步揭示的方式，每次只揭示一层信息或一个层面，然后继续深入下一层。它可能关注不同层次的政策影响、参与者、或政策的不同阶段，但每次只集中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层面。“解剖政策之鱼”更强调深入到政策的本质和核心机制，揭示其内在的混乱与复杂性。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性的理论模型。

“层层剥洋葱”偏向于描述性和分层分析，侧重于对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多维度呈现。“解剖政策之鱼”是为了构建“更新版”理论，暗示着对既有观念的更强烈的挑战和更根本性的重新思考，试图揭示政策的“真实面貌”，即便这个面貌是混乱而复杂的，表明了作者理论建构和解释力的抱负。

（五）广博的范围与丰富的案例

此书的另一显著亮点在于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广度和案例的丰富性。斯波斯基不仅涵盖了从个体、家庭到教育系统、社区、工作场所、公共机构、军事等所有重要的社会领域，还拓展到更广泛的历史与社会经济议题，如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语言濒危与保护、倡导者与管理者、以及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权利与政策。他从世界各地（非洲、欧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案例中汲取素材，包括濒危的土著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案例汇集，不仅证实了语言政策的普适复杂性，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不同情境下语言现象的丰富语料。

四、挑战与可改进之处

尽管《语言政策再思考》具有诸多亮点，并被誉该领域的“权威指南”，但该书在某些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一，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该书未能充分吸收和讨论近年来语言政策研究领域，采用民族志（ethnography）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路径的最新文献（Hult & Johnson, 2015）。这些研究方法能够追踪政策话语在不同层级间的流转，帮助解释语言政策是如何被建构、辩论、实施、采纳或抵制的，从而为斯波斯基所强调的个体能动性多层次互动提供更细致的分析工具。未能与这些前沿研究进行明确对话，或许是此书的一个遗憾。

第二，“命名语言”的争议。此书倾向于使用“语库”（linguistic repertoires）而非“命名语言”（named languages）来描述语言现象，认为“命名语言”更多存在于语言信仰和意识形态层面，缺乏本体论上的现实性。然而，这一立场对于语言政策研究而言可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操作”（Soler, 2023）。将其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建构，可能过于简化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并可能给那些试图削减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推广和保护资源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现成借口”。书中自身仍大量使用“命名语言”进行分析，也印证了在语言政策领域完全脱离“命名语言”进行分析的巨大困难。

第三，理论的抽象性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欠缺。斯波斯基引入复杂性理论提升了理论解释力，但其固有抽象性可能导致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中面临挑战，如何将“非线性互动”、“涌现现象”等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指南仍是一个难题（Soler, 2023）。此外，尽管斯波斯基的语言管理理论承认了信念和实践层面的复杂性，但他对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深层分析可能仍有提升空间。语言的地位和选择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结构、历史霸权、全球资本流动以及社会阶层划分紧密相关。强势语言的传播往往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推动，而不仅仅是其“市场效用”或“效率”所能完全解释的。

第四，二元对立的呈现与引用来源的局限性。虽然斯波斯基致力于揭示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并强调各层级间的相互关联，但他在书中通过对比微观与宏观层面，以及将它们置于不同章节进行讨论的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个体与国家”“微观与宏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二元对立。这种理论上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此书更彻底地展现语言政策作为一种复杂、混沌现象的精髓。

同时，此书在引用来源上过度依赖英文文献，在长达 45 页的参考文献中，非英文来源数量非常有限。这种单一语种的偏好，可能会忽视其他非英语学术传统中宝贵的知识贡献，导致知识的盲点（Soler, 2023）。虽然此书的案例广博是其一大优势，但这种广度也带来了一定的牺牲。大量案例

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案例的描述“缺乏精确性”，或者仅仅是“蜻蜓点水”。在有限的篇幅内，作者难以对每个案例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此外，在某些特定国家（如中国）的语言管理分析中，斯波斯基的分析未能充分引用中国学者的成果（如李宇明，2014；周庆生，2010），反而参考了一些存在偏见的资料，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五、结论

伯纳德·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学术著作，无疑将继续深刻影响语言政策领域的研究和讨论。此书最大贡献在于成功地将语言政策分析的重心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转移到微观的个体说话者，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通过丰富的全球案例，揭示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混沌性。他对非语言因素的强调，突破了传统“语言中心主义”的桎梏，为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同时，书中贯穿始终的反思精神，也鼓励读者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理论和实践，不轻易下定论。

然而，作为一部力求构建全面理论的巨著，此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局限性。在理论深度方面，它更多地展现了“是什么”，而非深入挖掘“为什么”和“如何”；对“命名语言”本体论的激进观点，可能在实践层面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在方法论的讨论上，未能充分吸收和整合民族志与话语分析等新兴路径；在参考文献方面，对非英文来源的有限关注，则提示了学术界内部存在的语种壁垒。此外，尽管此书致力于展现语言政策的复杂性，但在呈现微观与宏观互动时，仍未能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痕迹。

总体而言，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是其学术生涯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是对语言政策领域既有知识的梳理和整合，更是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指引。这些案例所暗示的语言政策的情境化、动态性和规模化特征，绝非简单的“语言现实政治”。相反，此书的优势与不足共同表明，语言政策理论创新的潜力将在于更细致的数据分析、理论层面的批判性开放、经验的微调以及研究者在面对不同情境时所具备的意识。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再思考》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对未来语言政策的远见卓识，其深远影响将持续引领语言政策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lt, F. M., & Johnson, D. C. (2015).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John Wiley & Sons.
- Jingzhen Liu & Manchun Dai (2024).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1(2): 1189-1195.
- Kress, G. (2009).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 Ricento, T. K., & Hornberger, N. H. (1996).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 *TESOL quarterly*, 30(3), 401-427.
- Soler, J. (2023).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by Bernard Spolsky (2021)".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17(1-3), 269-277.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olsky, B. (2021).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ang, Y. (2022). "Bernard Spolsky: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21: 621–623.

李宇明 (2014) : 《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

[Li Yuming (2014).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Vol. 3). Commercial Press.]

周庆生 (2010) : 《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

[Zhou Qingsheng (2010). *Nation, Ethnicity, and Langu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ies*. Yuwen Press.]